

# 现代汉语方言学奠基人之一罗常培教授

张 振 兴

## 一 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

汉语自古就有方言分歧。例如《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许慎《说文解字》序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滕文公上》记载孟子斥楚人许行是“南蛮狄舌之人。”<sup>①</sup>这些都说明我国古时候语言方言已经非常复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所以《颜氏家训·音辞篇》就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

语言方言的分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导致我国也具有非常悠久的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当首推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以下简称《方言》)。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则以铅镝次之于槩，二十七岁于今矣。”可见《方言》成书之不易！《方言》的记载，包括了周末至秦汉之间的大量方言资料，是世界语言学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专著，所以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称之为“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它比欧洲 18 世纪出版的最早的方言词汇专著《大俄罗斯方言词典稿》早了 1700 多年。围绕着对《方言》的注释和研究，在我国的传统语言学领域里，很早就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方言学”，其成果颇为大观。例如东晋郭璞的《方言注》，清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钱绎的《方言笺疏》，一直到近人周祖谟的《方言校笺》<sup>②</sup>。

与此同时，由《方言》开创的我国方言调查研究，自此之后也绵延不断，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例如《尔雅》、《说文》等一大批语文学文献，以及许许多多的经史文献，特别是典藏丰富的地方史志，都有大量的关于方言的记录、描写和注释，成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很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并没有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总是依附于我国传统语言学里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只是这几门学问的工具。这严重地影响了方言调查研究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遗憾的。

一直到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后，由于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一批中国最卓越的现代语言学家的艰苦努力，方言的调查研究才彻底地摆脱了传统语言学的附属地位，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现代汉语方言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罗常培教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理论到实践，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汉语方言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 二 罗常培教授在现代汉语方言学中的杰出贡献

罗常培教授在语言学领域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尤其突出。他最重要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活动是<sup>③</sup>：

1926 年秋至 1927 年夏，南下任教厦门大学，在此期间调查了厦门方言。

1928年转赴广州,任教中山大学,在此期间调查了广州方言。

1933年至1935年,分别在青岛、北平,调查了江西临川方言。

1934年,调查了安徽南部歙县等六县方言。

1938年至1944年任教西南联大期间,调查了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

罗常培教授一生有很多著名的方言学论著,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最重要的论著如:

《厦门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本,1930年。

《临川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本,1936年。

《徽州方言的几个要点》,《世界日报》国语周刊,1934年。

《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国青年》,1942年。

二是关于古方言或方言史的研究与考证,最重要的论著如: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本,1933年。

《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931年。

《明清学者对于方音研究的贡献》,《世界日报》国语周刊,1933年。

本文重点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三部专著:《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从中可以看出罗先生在建立现代汉语方言学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 (一)《厦门音系》

本书1956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再版。这是罗先生最重要的方言学著作之一,也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把现代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徽语、客家话、平话十类。厦门话属于闽语的闽南话,是闽南话的一种优势方言。由于闽南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大量的海外移民,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闽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厦门话长期以来成为汉语方言中,最具有海内外影响力的方音之一。对厦门话以及周边方言的调查研究有很长的历史。1800年黄谦编纂反映泉州话的地方韵书《彙音妙悟》,稍后,谢秀岚编纂反映漳州话的地方韵书《汇集雅俗通十五音》。还有无名氏的《渡江书十五音》,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地方韵书,反映了厦门及周边方言早期的研究水平。它们都用代表字反映了方言音类的分别,例如用十五音母表示15个声母,用五十字母表示50个韵母,用八音表示8个声调。但是这些音类不表示音值,只知道类别不同,不知道具体读什么音。1840年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对厦门方言作了调查研究。最有影响的是Carstairs Douglas(道格拉斯)的《厦门白话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 W. Campell(甘为霖)的《厦门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1913)。这些字典以及同类的著作,都用罗马字母标注了厦门音的音值,这是厦门及其周边方言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真正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科学方法对厦门话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的是罗常培教授。同时又对厦门音系进行细致的描写、分析的,当首推罗先生所著《厦门音系》。该书本论部分主要有厦门的语音、厦门的音韵、厦门音与十五音的比较、厦门音与广韵的比较、标音举例等五个部分。周长楫(1999)对这五个部分的内容曾有详细的评述。有意思的是,罗先生在1955年所写的“再版序言”里,曾经说到《厦门音系》的可取之处,非常客观。我们可以逐一分析。

第一,罗先生说“它是应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来详细分析一个重点方音的”。本书首次提

出了一个科学而完整的厦门话声韵调系统,18个声母,57个韵母,7个单字声调。而且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个系统作出了准确的描写和说明。例如关于b-m、l-n、g-ŋ三对声母的分析,[ts-]组与[tɕ-]组声母的讨论;对韵母音位的归纳;对7个单字声调调值和连调的描写,就是以今天研究的眼光来看,都是非常准确、到位的。

第二,罗先生说,本书“对于厦门音跟广韵的比较分析的相当精密”。本书首次把一个重点方言的音系跟广韵音系进行了列表比较,说明了广韵47个声类与厦门18个声母、广韵16摄与厦门57个韵母、广韵四声与厦门7个声调的关系,细致而完备。从比较中,得出了厦门话古今演变的规律和特点。这是前人研究厦门话所没有做过的,比较条例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第三,罗先生说,本书“提出了厦门话字音和话音的转变条理”,“指出了区别字音和话音的重要性,因而引起后来调查福佬话或客家话的人们的注意,对于推进方言研究的发展上是有相当的意义的。”本书首次总结了厦门话字音和话音(文白异读)规律,第一次给人们展示了厦门话一幅纷繁复杂,绚丽多彩的文白读音画卷。

第四,罗先生说,本书“长篇故事和民间文艺的记录,对于研究词汇和语法的关系非常重要”,“本书的五篇标音举例是有带头作用的。”

在“再版序言”里,也列出了《厦门音系》的五点“不满意”的地方。我认为从读者角度来说,真正说得上还有建议的地方,是厦门音跟广韵的比较表格太多,略嫌烦琐,也许可以略加简化。从这里可以看出罗常培教授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所具有的不断追求的精神、谦虚自检的品质。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厦门音系》从现代方言学理论体系和反映语言事实的准确性两个方面,奠定了厦门方言研究的基础。在罗先生之后,厦门方言不断被记录、研究,但在音系研究方面,基本上沿用了《厦门音系》所确定的框架,只是分析和描写更加细致了。在词汇、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董同龢《厦门方言的音韵》(1957),《四个闽南方言》(1959)。其中声母的记音和分析与《厦门音系》几乎完全相同;韵母62个,绝大多数相同,明显有差别的地方是多出了9个带喉塞音[-ʔ]尾的入声韵。也许《厦门音系》记音时的发音人是还没有[-ʔ]尾韵的;声调只有调值方面很细微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厦门话研究成果,所反映的音系跟《厦门音系》略有不同。例如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1998),声母没有[dz-],这是厦门话语音变化的结果。古日母字早期厦门话有人从漳州一带的读音读为[dz-]声母,后来都读为[l-]声母了;韵母数量达到82个,主要增加了26个带喉塞音[-ʔ]尾的入声韵,以及[ɿʔ aʔ iaʔ]之类的鼻化喉塞尾的入声韵。增加了鼻化入声韵,主要是由于大量记录了拟声词的结果;声调基本没有差别。

## (二)《临川音系》

本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58年也由(北京)科学出版社重印再版。谢留文(1999)指出,本书“不仅是我国早期汉语方言研究的一种著名调查报告,也是关于江西汉语方言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临川,有宋一代名相王安石生于此,诗文集就叫《临川集》。在江西省东部,即今抚州市。临川方言今属于赣语,是赣语抚广片。《临川音系》“自序”说到调查研究临川方言的缘起。1933年罗先生在青岛第一次遇见游国恩先生时,游把“临川”说[tim<sup>35</sup> tʃuan<sup>31</sup>]。这个说法有三个特点引起罗先生特别的注意:1)闭口韵的[-m]尾还是像闽粤方言那样保存着;2)来母字在[i]元音的前头从[l]变成[t];3)穿母三等字从舌面塞擦音声母[tɕ-]变成舌尖塞音[tʰ]。

这几个特点我们今天已经见得多了,但在 80 年前知道的人很少。可见罗先生对语言现象有高度的敏感性。它促使产生了一部经典性的方言学著作。

《临川音系》本论部分有语音的分析、本地的音韵、比较的音韵、特殊词汇、标音举例等五个内容。通过这些章节,详细地描写和分析了临川方言的语音系统。我们后来对本书更为关注的是,罗先生通过临川方言的研究,特别是通过临川话和梅县话的比较,发现两者有很多共同点:1)全浊声母字今读送气声母;2)晓匣两母的合口字今读[-f]声母;3)保存闭口韵的[-m]、[-p]尾;4)蟹山两摄保存古一二等分立的痕迹;5)鱼虞两韵精母字和见系字读[-i]开头的韵母;6)侯韵字读作[-ɛ:u]韵;7)梗摄字的话音读作[-aŋ]、[-iaŋ]韵。

临川话和梅县话这些共同点怎么来的?本书从客家族群迁徙的历史和途径,讨论到客家南迁与江西方言所发生的关系。从移民史实讨论语言现状,从语言现状讨论移民史实。这就是罗先生所强调的研究临川方言的重要意义。据此,罗先生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客家方言和赣方言的关系问题,并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认为它们是“同系异派”。在当时方言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罗先生首先注意到客家话和赣语的密切关系,应该说,他慧眼独具,其眼光之敏锐,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具备的。

赣语成为一个单立的方言,始于 1948 年。在此之前,赣语或被划归华南官话,或被划归下江官话。1948 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第 5 版 14 页“语言区域图”,首次列赣语为汉语的一个单立方言区。我们有理由推测,赣语分立可能是罗先生《临川音系》研究促成的。《临川音系》正式单独刊行是 1940 年,赣语被划归官话恰好是 1940 年以前的事情。因此,《临川音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性的意见:赣语分立。它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命题:客、赣方言的关系。是分还是合?

赣语分立,极大地促进了赣语方言和江西省方言的调查研究。客、赣方言的关系,在此之后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中国语言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至今仍然引起热烈讨论。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客家方言的调查研究。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约半个世纪后,罗常培教授的学生,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李荣教授,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主持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时,也提出了晋陕豫三省晋语分立、湘粤桂平话单立的命题。这个命题同样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家的极大关注,同样极大地促进了晋语、平话地区的方言调查研究。把汉语方言的研究引向一个高潮。

这就是汉语方言学的魅力。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提出新的思想,新的命题,引发讨论,激励探索。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死水平潭,了无声息。但是提出新思想、新命题,需要学识、智慧、胆略和魄力。罗常培教授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具备所有这些难得的素质。

《临川音系》在具体的方言分析、比较方面,也比《厦门音系》跨进了一大步。

1) 首次增加了单字音表和同音字表,并且据此讨论分析了临川音系的语音结构规律,临川语音的共性。

2) 首次增加了临川语音与北平(北京)语音的比较,并据此提出了临川人学习国语(普通话)的方法。

3) 在临川音与广韵音系比较之后,逐条讨论分析了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而且非常细致、精彩、透彻。例外检验规律。我们现在很多方言调查研究报告都做不到这一点。

4) 增加了特殊词汇表,收录临川方言特殊语词 455 条,分为 22 类,类似于后来的分类词表。用这个词汇表可以检验临川音系。

可以看出,从《厦门音系》到《临川音系》,罗常培教授初步奠定了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格局。

### (三)《唐五代西北方音》

这是研究古方言领域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它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研究古方言最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是利用文献记录。例如利用扬雄的《方言》等材料,我们可以研究秦汉时期方言的大致面貌,分布状态。还可以利用地方韵书、韵图、志书,研究具体的方言面貌。通过这个途径研究的古方言面貌一般是比较模糊的,语音上一般说来只能讲类别,或拟测。

二是利用中外、族际对音材料。例如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唐西北地区,以及部分中原地区的汉语方言语音系统;利用汉越语对音,研究早期南部汉语方言语音词汇系统;利用日本汉音、唐音、吴音,研究早期东南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通过这个途径研究的古方言面貌相对来说来比较清晰,以致有可能构拟出相当准确的音值来。

以上两种途径,都必须有现代汉语方言事实的有力支持。

《唐五代西北方音》利用的是族际汉藏对音和藏文译音材料:包括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唐蕃《会盟碑》拓本。研究的步骤是:

首先把藏文对音或藏文译音转换成音标,由此知道汉文字的汉语读音,并由此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有很多前人所没有说过的特点。

然后把这个语音材料跟《切韵》系统进行比较,去追溯汉语读音的来源,当是属于唐中叶陇西一带的方言。

之后对比现代西北地区兰州、平凉(甘肃),西安、三水(陕西),文水、兴县(山西)等三省六处音系,加以验证,同时可以看到唐五代西北方音到现代西北方音的演变。

最后得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面貌。本书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具有一些重要特点。下面可以简单举出几条:

- 1)轻唇音“非敷奉”多读送气音[pʰ-]声母,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显露出重唇音分化的痕迹;
- 2)舌上音混入正齿音;
- 3)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
- 4)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
- 5)通摄的一三等字元音不同;
- 6)一等二等字的元音大多没有分别。

由此可见,《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材料做得非常扎实,程序非常严谨,所得结论是可以相信的。在古方言研究领域,把族际材料、切韵系统、现代方言三者这么紧密地,科学地结合起来,构拟出一大片区域的古方言语音系统,罗先生所做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 三 从罗常培教授到现代汉语方言学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在建立现代汉语方言学的过程中,罗常培教授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厦门音系》初步奠定了厦门方言研究的基础。《临川音系》初步奠定了赣语研究的基础。这两个研究初步奠定了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著作,在汉语方言研究中:首次构建了语言演变规律和语言结构规律的理论框架;首次应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对一个重点方言进行了深刻的语音分析;首次提出了客、赣方言关系的命题,初步建立了比较方言学的基础。

《唐五代西北方音》在古方言的研究方面,同样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它把族际对音、切

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研究系统。这使罗先生在古方言研究领域中,达到了一个高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其右者。

因此,罗常培教授的三部著作,跟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著作一起,成为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经典之作、奠基之作。从事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人,必读这几部著作。我们后来者可以从这些著作里吸取极为丰富的学术营养。

罗常培教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还继承并发扬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一种优良传统,一种优良学风。这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说到这里,一定要提到另一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他也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赵元任主要侧重于大范围的方言调查,方言比较研究,例如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他所领导的南方五省方言调查,所主持编著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以及其他许多方言学研究论著。罗常培、赵元任,两位中国最卓越的现代语言学家,他们携手并进,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从不同侧面,为建立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名字是跟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赵元任、罗常培等一代中国最卓越的语言学家开始,汉语方言学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在最近半个世纪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构建中国语言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sup>④</sup>。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历史是一部具有强烈学派意识的历史。赵元任、罗常培、丁声树、袁家骅、李荣等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把汉语方言学推进到了一个高峰。他们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的是一条继承、光大、发展、创新我国优秀学术传统的道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可以感到自豪和骄傲。

汉语方言是最重要的语言资源,最大的语言财富,最应该重视的一种经济文化环境。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现代汉语方言学。要继续发扬现代汉语方言学中一切优秀的成分。越是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越有可能走向世界。略为了解学术史的都会知道,世界学术之林总是多样化的、多元化的。我们应该有一种良性的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给传统的、民族的优良学术思想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完全平等的竞争平台。我们要保护自己民族的优秀学术文化。

## 附 注

- ① 见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
- ② 见华学诚著《汉语方言学史研究》,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 ③ 见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中国语言学家传略》(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④ 见张振兴《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载《中国语言学现状和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 参考文献

- 董同龢 1957 《厦门方言的音韵》,[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  
—— 1959 《四个闽南方言》,[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  
谢留文 1999 《重读〈临川音系〉》,《方言》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周长楫 1998 《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1999 《重读〈厦门音系〉》,《方言》第3期。

(张振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